



戳穿右派污蔑肃 反运动的真面目

廖 公 宣 編 写



戳穿右派污蔑肃反运动的真面目

廖公宜编写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4印张·28,000字·印数：10,072—33,085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56 定价(5)0.11元

前 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輝煌胜利的今天，共产党为了更好地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开始了整风运动。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错误的以为这是他们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大好时机”。便从资本主义的僵尸里爬出来，到处摇旗呐喊，露出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镇反和肃反运动。他们用颠倒黑白的手法，到处散布谬论，说镇反和肃反运动“糟糕透顶”，说“缺点和偏差是主要的”，说搞运动是“庸人自扰”，说“不反也肃，有错不纠”，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提出，要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等等。妄想否定镇反和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镇反和肃反斗争的必要性，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实际上这就是要人民放下武器，让反革命复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我国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敌伪统治的年代里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污蔑镇反和肃反运动的卑鄙目的是极端阴险恶毒的。因此，对他们的鬼蜮伎俩必须予以戳穿，对他们的恶毒阴谋必须予以彻底的粉碎，才能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坚强和巩固，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

目 录

前 言

- 一 鎮反和肅反是絕對必要的..... 1
- 二 肅反一定要搞运动..... 8
- 三 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17
- 四 “有反必肅,有錯必糾” 27

一 鎮反和肅反是絕對必要的

是“庸人自扰”嗎？

辽宁省的右派分子高風、張百生、黃振旅等，乘着黨整風的機會，高唱着與“美國之音”、台灣“自由中國之聲”有着“異曲同工”的調子，污蔑我們的鎮反和肅反鬥爭的必要性。說什麼：“不反亦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

鎮反和肅反鬥爭究竟有沒有必要，這要從當時的政治形勢、敵情來看。1951年，是國內外敵情非常嚴重的年頭，國外抗美援朝戰爭正在劇烈進行，國內殘余反革命大量存在，人民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自知那次大鎮反無懈可擊。於是，他們的謠言醜論主要針對1955年的社會鎮反和內部肅反鬥爭。現在，就讓我們回憶一下1955年的情景吧！

1955年，是處在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前夜。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因此，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列寧曾說過：“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樣），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注）

注：摘自列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52頁。

当时，美蔣特务机关，在臺灣、香港、南朝鮮、日本、菲律賓等地，搜罗一切亡命徒，訓練成特务間諜，大批地向我国大陆派遣，以陰險隱蔽的手段进行罪惡的破坏活动。国内还有相当数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阶级斗争趋向剧烈的时期，他們代表着即将被徹底消灭的剝削制度的利益，到处蠢动，进行垂死的反抗。反动地主分子，怀着复仇的野心；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拒絕改造，圖謀反抗。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也猖狂地活动起来，严重地破坏着社会主义秩序。

以辽宁省为例，当时各种現行破坏案件驟然增加。只凶杀暗害案件就發生300多起，杀死干部、群众186人，杀伤353人；厂矿企業内部的破坏事故竟發生800多起，直接損失就有800多万元。如果以1954年現行破坏案件的發案率作100，1955年1—9月便已达到172了。美蔣派遣的特务間諜案件，1954年比1953年也增加了150%，1955年上半年又比1954年同期增加了25%。而各种刑事犯罪案件，1955年一年中竟發生了11,259起。

这是数字，下面再談談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具体情况。

特务間諜分子潛入辽宁省內后，即積極網罗残余反革命，發展組織，加紧进行搜集情报活动。窃取我各地駐軍番号、兵种、装备、武器数量、作战能力、动向等軍事秘密。同时，并張貼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和信件，大肆造謠恫吓。沈阳市長、安东市長、營口市長、鞍山市劳动模范王崇倫、旅大市金县中心完全小学模范教师陶盛然等人，都接到了特务分子無耻的恐吓信。沈阳市的“反共救国軍”特务組織，甚至陰謀搶夺我軍政人員槍支，組織武裝暴乱。

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在厂矿、企業、学校内部，制造破坏事故，进行破坏。潜藏在沈阳建筑工程局第三分公司的蔣匪特务田玉昆，放火燒掉工地材料倉庫中全部建筑器材和三幢宿舍，并把

前往救火的中共支部書記張殿龍同志打昏。潛藏在本溪鋼鐵公司煉鐵廠化驗室的反革命分子樊孝忱，勾結袁洪濤、王遠迪、李國林等人，成立反革命組織“中國民政黨”，偷盜工廠許多毒性和烈性葯劑，在人民的化驗室製造炸葯，準備炸毀人民的工廠。混入岫岩縣農林局的特務分子王鈞珍，在興修五處大小水利工程時，偷改圖紙，移動工程位置，給國家造成5,900多元的重大損失，更嚴重的是如果這種暗害手段，不及時發現，一旦遇到洪水，工程即有被沖毀的危險，不僅土地遭淹沒，附近居民的生命財產也難保安全。

反動資本家在糾合密謀、策劃抗拒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了“總參謀”之類的稱號，有的資本家痛打工人，聲言要打死國家稅收幹部。沈陽市和平區德生號資本家周天文，因工人田曉峰揭穿他違法行為，乘夜持菜刀將田連砍7刀。

農村反革命和地富分子在殺人放火，瘋狂破壞合作化運動。沈陽西郊大榆樹村，邢德昌等3個反革命富農分子，殺死我農業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一家8口，並慘無人性地縱火焚尸。康平天壽莊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被混入社內的反動“白洋教”教徒劉萬銘放火燒掉房屋3間，燒死燒傷牲畜13頭，谷草10,000多斤，農具和其他財物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戴明保，勾結壞分子，煽動和糾合落後群眾，把遼中縣六區前鮎魚泡村供銷社庫存的3,163斤糧食，全部搶光。甚至有的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與“活閻王”、“活扒皮”等地主、富農分子串通一起，操縱村政權，仍然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群眾稱之為“小台灣”。

反動封建會道門活動更是猖狂，僅遼寧省就出現過3個“皇帝”，沈陽市還有準備擇吉日登基坐殿的“皇帝”，他們選“皇妃”，立國號，封侯拜相，妄圖建立王朝。

就是已經被我們逮捕入獄的反革命分子，有的也並沒有放

弃他們的反革命野心。旅大市一个在押反革命犯公开对我管教干部吓道：“你得把我們全放了，若不，我們就革你們的命！我承認階級斗争是尖銳的复杂的，咱們立場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以后，我們重新統治你們！”

大家听听，这就是右派分子所說的“天下本無事”的情景。

在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实面前，人民群众不是覺得“天下本無事”，而是批評人民政府“寬大無边”了，甚至有的群众亲自到公安机关指責：“你們对反革命寬大的連門框都沒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障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順利进行，要保衛人民群众安居乐業的生活，不搞鎮反和肃反斗争，不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把反革命的囂張气焰狠狠地打下去行不行呢？人民政府不給人民作主行不行呢？肯定是不行的。

但右派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看法却有“天淵之別”。他們認為“这不算囂張，不需要鎮反”。究竟怎样才算囂張呢？是不是要象匈牙利十月事件那样，反革命公开搞大規模的武裝叛乱才算囂張呢？如果到那样的时候才搞鎮反和肃反斗争不就太晚了么！如果遂了右派分子的心願，就沒有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了，那將是中国倒退几十年，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这不是十分明显的么！

在反革命分子囂張活动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却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地称之曰：“天下本無事”“不反亦肃”。他們所說的“天下本無事”的“事”字和“不反亦肃”的“反”字，大可玩味。“事”字不外是指“反革命暴乱的事”，在人民看来是反革命暴乱，在右派分子看来当然就成了革命的正常活动，既然如此，当然無須鎮压了；在人民看来是“反”，在右派看来則为“正”，既正何須再“肃”。这就是右派分子所發一切謬論的根据。

“借他人灵堂，哭自己心事”

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又發出奇談怪論，他們說：“有些人雖然殺過革命志士，但他是出于無奈，執行上級的命令。”瞧，他們對反革命分子的同情和庇護，是多麼無微不至，反革命殺人放火倒是理直氣壯的哩！有人曾經戳穿他們這種論調在邏輯上的荒唐謬誤，按他們的邏輯推論，只有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是發令人，其餘反革命都不能懲辦了。當然，反革命分子中，確有少數分子是被威脅利誘而干了些壞事情，但這在“首惡必辦，餘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中，早已體現了處理這種人的寬大精神。右派分子所指的顯然不是這種人。而那些解放後仍拒不坦白，甚至為非作歹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類，又怎能談得上“出于無奈”呢？右派分子之所以對人民的敵人特別袒護，階級本能和裙帶關係都是原因。儘管他們的右派手法玩弄得多麼巧妙，只不過是“借他人靈堂，哭自己心事”而已。

“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張百生、黃振旅又說：“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與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二位先生說對了。國家是一種階級統治的機器，它就是一種暴力。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承認有什麼“超階級”的國家機器，它只是統治階級專用的。對統治階級說來是維護民主的工具，对被統治階級說來就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鎮反和肅反鬥爭是國家執行對內職能的一項活動，當然也是暴力。問題在於這種暴力是對付誰的。維護革命果實難道不需要暴力嗎？巴黎公社失敗的主要教訓，是對階級敵人

“过于慈善”；建国11年的匈牙利之所以發生十月事件，也正是由于無产階級專政的国家暴力运用得不够充分。这些工人階級革命的历史教訓，深深印在每个革命人民的心里。实际生活的磨煉，使每个革命者懂得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殘忍”这一条真理。反动統治階級的国家，对劳动人民历来都用暴力，而且是慘無人道的暴力，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就是典范。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对階級敌人的反抗难道就不應該用暴力嗎？难道應該去施舍象“东郭先生”那样的慈悲心嗎？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早就說过：“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階級的反抗行为，决不施仁政。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階級的反抗行为。”我們不革掉反革命分子的命，他就会反过来革掉我們的命。这就是千千万万血的教訓所换来的革命的經驗。右派分子特别善于运用“偷天換日”的把戏，妄想借反对暴力来否定鎮反和肃反斗争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性。其惡毒用心，警惕了的人民一看便穿。右派先生們之所以力竭声嘶地叫囂反对国家暴力，不就是因为这种暴力沒有掌握在他們手里嗎？

鎮反、肃反正是“以德治国”

“爱民如子”“以德立国”和“以法治国”这几条思想，也不是抽象的东西，在階級社会中，它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所爱之“民”，是劳动人民、是願走社会主义道路之“民”；立国之“德”，是“共产主义道德观”；治国之“法”，是維護广大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道路之“法”。这，确与所謂“傳統思想”“背道而馳”。翻一下我国历史不难看到：封建社会所爱之“民”，是家有万頃良田的地主富豪；所施之“德”，是“封建礼教”；所执之“法”，是“衙門口朝南开，有理沒錢別进来”。蔣介石所爱之“民”，是封建买办、官僚資本

加上帝国主义走狗；所施之“德”，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所执之“法”，是“劳动人民有受苦权，吸血虫有享福权”。象这样的“傳統思想”，难道也值得贊揚和效法？看来，由于一顆卑鄙的心灵，对崇高的东西是永远不可理解的。

右派分子張百生又說：“治国必須以德，杀了不合适，以武力建国等于建立在冰山上，一旦春風来了，一切冰冻瓦解了，多杀人是缺乏历史观点。”說得多么动听！但并不是吉利話，只不过是耍裟包裹着的毒箭。因为他要我們效仿的“德”，是“傳統盛德”，即孔孟的“尊王攘夷”加上輪回报应之說，也就是“胡涂主义，唯無是非观等等”（魯迅語）。历代封建統治者都是用“傳統盛德”来奴役人民，一直到蔣介石又何尝不是高唱着“四維”“八德”来进行血腥的統治呢？人民的国家难道能用这种“德”来治国嗎？至于他說我們把人杀多了，則是地道的誹謗。事实上，我們杀的只是反革命中極少数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的分子，而杀掉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恰恰是“以德治国”。只不过这“德”是共产主义的“德”，而不是什么“傳統盛德”罢了。右派分子儼然以維護人类道德自居，可是他們的叫囂，就連“扫地不伤螻蟻命，爱惜飞蛾單紗灯”的佛教信徒都聞之作嘔。有位佛教代表說：“杀反革命分子和佛教的杀戒并不矛盾。因为杀掉極少数的反动分子，救活了最大多数的人民，并且警戒了犯罪的人少犯罪，这是功德。”

中国有句成語：“誅惡魔即是善念”。我們所鎮压的不正是些惡人嗎？昌圖县有个反革命分子叫王德文，在为匪期間到处搶掠，杀害人命，活埋了自己重病的姐姐还不算，而且又用2斗小米加20塊土坯把自己患病的母亲活活压死。沈阳皇姑区有个特务分子叫高振鵬，隐瞒罪恶拒不交代，唯恐露出馬脚，竟下毒手砍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天真的孩子。这些灭絕人性的劊子手，

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喊“杀共产党人”的右派先生眼里，当然算不得什么犯罪，可是在人民眼里，却是“把他们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問題很清楚，人道的最本質的特征是劳动，而一切剝削階級是喪失了人道的这个極重要的方面的。右派分子虽然也喊“人道”，語言并無区别，但和我們心目中的“人道”畢竟是迥然不同的。

由此可見，“建立在冰山上”的不是別个，而正是右派分子的謬論，果然“春風来了，一切冰冻瓦解了”。他們只好學着章伯鈞的樣子，狠狠地打着嘴巴說：“我是無耻！”

二 肃反一定要搞运动

群众路綫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灵魂

前面已經說过，1955年是处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必須迅速地肃清大量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因此，鎮反和肃反斗争必須走群众路綫。实行全党动员，發動群众起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可是右派分子張百生和黄振旅却說，“搞了一个惊动全民的大运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量多質高的公安軍和公安局完全可以对付得了。”

不錯，我們公安机关确实是国家对反革命实行懲罰的机关，是祖国建設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忠实保衛者。他們經過千錘百煉，广具智謀，可以战胜反革命分子，已經并且要繼續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是，公安机关并不因此而絲毫忽視人民群众在肃反斗争中的偉大作用。恰恰相反，公安机关所以能够有無穷尽的力量，所以能清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正是依靠广大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綫的結果。

历史唯物主义告訴我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和推动者，人民群众必須而且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給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并且领导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去争取和創造美好的生活。因此，为了群众而又依靠群众，便是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根本路綫。这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对于肃反斗争和人民公安机关說来，当然也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問題。

必須發動群众来对付反革命

鎮反和肃反斗争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自觉的革命运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的这一正义要求，必須积极地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和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我們大家都知道，在1951年鎮反时，許多反革命分子都是浮在表面上公开的进行活动，是比较容易发现和肃清的。经过鎮反运动以后，我們又不断地給了反革命以沉重的打击。使反革命分子学得乖觉起来了，他們由公开的、明目張胆地活动，就轉入隐蔽地、秘密地、和采用兩面的手法进行活动。于是許多反革命分子改名換姓，伪造历史混入我党、政、軍、机关和厂矿企业、学校中，伪装积极，甚至有的騙取了英雄、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暗地里則利用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空隙进行破坏活动。一些罪大恶極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挖了地洞，造了夾壁牆，象老鼠一样在天棚、地洞里潜藏起来。对这样一些反革命分子，單單依靠公安机关的力量是不行的。因为公安机关的人员是有限的，他們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不可能注視到每一个角落，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更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而反革命分子却恰恰生活在群众中，活动在群众中，隱藏在群众中，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群众是一面“照妖

鏡”。只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和識別反革命的能力，才能使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暴露出来，給予肅清的。

在1955、1956年的肅反运动中，只辽宁省人民群众就写了90多万件檢舉信，协助政府查出兩万多反革命分子的事实，就是証明。

美蔣特务机关在1955年9月派遣来搜集我方軍事情报的特务分子赵德梁和費振英，剛剛在庄河县登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活动，就被两个小学生發現他們埋藏在山上的通訊联络工具，报告給公安机关，这两个特务当时就被捕了。

長白县的双手粘滿革命志士鮮血的反革命分子韓守武，从1951年逃来沈阳市張中衡家，在天棚上藏了5年多，尽管他在天棚上安有傳遞信号的电灯，又在屋里挖了地窖，設有特制的木箱，以备必要时改变躲藏地点，但最后也还没有逃脫人民的惩处。因为窩主張中衡的兒子張树棠提高了觉悟，向政府告發了他。

逃犯曹振山逃到沈阳后，被認識他的一个群众刘福發現。为了調查曹犯的下落，刘福主动的自备路費由沈阳到洮南，到長春，往返4次，最后一次因为没有路費，把身上穿的小布衫都卖了。到底协助公安机关把他捉住。

本溪有一个一貫魚肉乡里的反革命分子刘錫鑄，群众呼之为“刘黑手”。从1951年鎮反时起，公安机关逮捕他兩次，他都狡猾地逃脫。可是群众却从他哥哥和他老婆常常往来辽阳和本溪之間的鬼祟行动中發現了疑点，报告公安机关。这个隱藏在山洞中3年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是落进了人民的法網。

这些事实就足以証明：只要人民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充分而广泛地發动群众，提高他們的革命警惕性和識別反革命的能力，就可以形成严密的天罗地網，使一切反革命分子插翅难逃。

人民的强大威力，迫使反革命分子不得不坦白自首

人民群众这种为保卫自己革命成果与生命财产安全的自觉行动，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和威力，使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起来，战慄失色，无处隐匿，不得不出来坦白自首。仅辽宁省，在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有13,000多名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并交出大批枪支、弹药。

亲自参加活埋3名村干部的“还乡团”分子封亭春，解放后畏罪潜逃，从青岛而烟台、潍县，最后逃到大连。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听说有人检举他，吓得上吊，自杀未遂，以后他就逃到东宁县，以为那儿偏僻，可以隐藏起来，可是逃到东宁不久，他的本家叔叔听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就督促他回到大连向公安机关交代了罪恶。

营口县反革命分子张丙奎，1951年镇反时，畏罪躲到辽阳县一个亲戚家，后来怕藏不住，又跑回家在天棚里一直藏了5年多。肃反运动中，他的侄女提高了觉悟，一再向他的老婆进行教育并质问他的下落，逼的他不得不从天棚上下来坦白自首。

反革命分子王庆余，在1946年我军解放康平后，畏罪逃到广东省新惠县靠近香港的一个村子，以养蜂为业，企图待机逃往台湾。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听了政策宣传后，就给康平县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外逃多年，也没有出路，现在愿投案自首。如果宽大处理，就感谢政府免死之恩；如果不予宽大，也是罪该得。”随后就回康平自首了。

当然，这些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首先是祖国建设的美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和政府宽大政策感召的结果。但是，群众的强大威力，毕竟是迫使反革命分子投降缴械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庆余的话，恰恰证明了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果不向

人民坦白自首，就再找不到別的出路。

肅反沒有發生大的錯誤，就是因为走了群众路綫

鎮反和肅反工作所以要实行群众路綫，不仅是群众積極投入斗争变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而且因为掌握了政策的群众，一方面可以成为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可以督促專門机关正确地掌握和貫徹党的政策。以辽宁省为例，在一年多的时期內能够查出兩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沒有發生大的錯誤，这就証明了采取專門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結合的方針是正确的。

既然事实是这样，为什么右派分子要否認群众的偉大作用，反对群众运动呢？这并不奇怪，因为右派分子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的本身就是反革命分子，他們都和反动統治阶级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反动統治阶级是压迫人民群众的，是不要人民群众的，也是害怕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反动派干的那些見不得天日的勾当，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大都是不敢公开进行，而用秘密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們反对我們走群众路綫，反对我們搞群众运动，要我們采取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方法去进行。我們的鎮反和肅反斗争，是正大光明的，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的。如果在我們的鎮反和肅反斗争中，也錯誤地采取神秘主义和孤立主义去进行，它只能使我們的公安机关脱离群众，發現不了敌人，打不中反革命。当然，我們是不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

沈阳市北郊观音屯，在土改中由于沒有充分發動群众，反革命分子那生奎、孙安奎操縱了农会，土匪头子白云飞在幕后指揮。他們为地主富农偷改成分，把好地分給地主富农，把山地、薄地分給貧苦农民。1951年大鎮反中，由于我們的一个民警沒有很好的执行上級的指示，群众沒有發動起来，鎮反运动沒有很

好开展，使反革命分子蒙混过去，屯里成了反革命分子作威作福的乐园。他們任意打罵群众，勒索农民粮食，破坏党的各項政策，阻撓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人民生活仍暗無天日，敢怒而不敢言，說观音屯是个“小台灣”。直到1955年肃反运动中，人民政府給群众撑腰，真正充分地發动了群众，群众才敢于起来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坚决地打退了反革命分子那生奎等人的数次反扑，最后把那生奎等人逮捕了，其他反革命分子也随之坦白自首，交出武器。群众一致欢呼：“观音屯解放了！从今往后，政权是人民自己的了！”

观音屯的事实充分証明了：不要說不去發动群众，就是發动群众不充分，不广泛，要想給予反革命势力以有力打击，而不犯放縱敌人的錯誤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放手發动群众，絕不等于党放松对斗争的領導，把党降低到普通群众的水平，作群众的尾巴。党是斗争的指揮者与組織者。同时，放手發动群众，絕不等于不要或者可以削弱專門机关的工作。專門机关既須依靠群众，也要帶領群众，成为群众斗争中的骨干。只有專門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結合，才能大量的肃清反革命殘余势力，战胜任何狡猾的敌人，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

我們依照党的群众路綫，广泛而深入地發动了群众，使一切的爱国人士都参加了肃反运动，形成了肃清反革命的强大力量，可是右派分子們却說我們肃反运动走的是“打手路綫”，这只不过是惡毒地污蔑而已。

小組斗争是群众路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人道的

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不只是群众路綫，他們对肃反运动的具体工作方式也进行惡毒的攻击。